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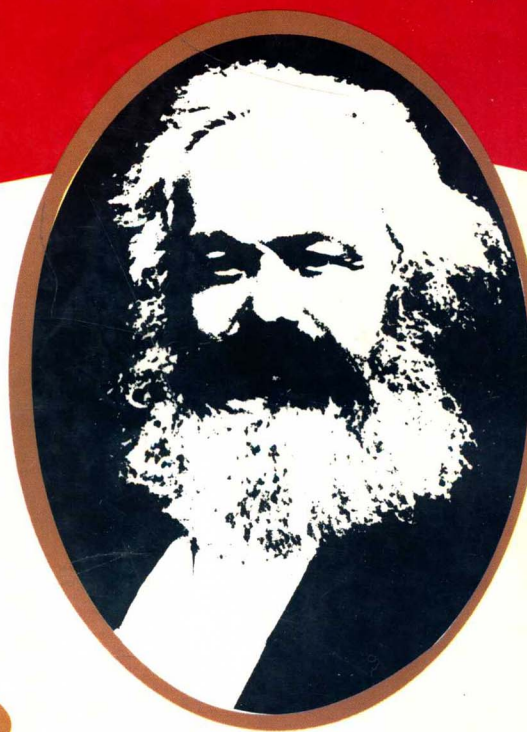


主 编 万 斌

副主编 马建青 张继昌 包 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MAKESIZHUYI YU DANGDAI



2003



浙江大學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03)

主 编 万 斌

副主编 马建青 张继昌 包 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海燕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900662-71-5/G·83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论理想及理想主义的教育	万 斌	张应杭(3)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精神对人生的影响	王东莉	(14)
人的本质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浅论	沙 红	(21)
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	杜庆华	(29)
思想政治工作不应有真空地带	王 克	(35)
公民道德建设与制度保障	王明霞	殷开达(39)
对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李小芳	谢嘉梁(4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的现状与思考	杨 燕	张云飞(51)
新时期对加强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几点思考	谢嘉梁	聂德民 李小芳(58)
主体参与式德育课教学模式的再思考	王 勤	黄 莺(65)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几点思考	张云飞	(75)
私有资本的发展力与社会发展的调节力 ——读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后的一点思考	罗许成	(82)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可持续发展	仰 滢	(91)
实践经验:列宁与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视角	陈湘舸	包 松(98)
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理论的现代反思	楼慧心	(105)

社会主义理论专题研究

试论邓小平的政治道德观·····	段治文 丁明鲜(117)
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的命脉·····	张国钧(128)
试论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的有机结合·····	张云德(136)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取向·····	王 欢(144)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的冲击·····	王海稳 王 勤(152)
“第三条道路”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比较·····	焦凤梅(161)
发展的三重困境	
——兼论现代政府的作为·····	金 奇(169)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吴 敏(175)
试论抗战前夕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郭汾阳(183)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吗	
——评《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	张继昌(195)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缘起·····	赵 晖(203)
论市场信用的法律构筑·····	包 松(210)
关系社会中法治何以可能·····	丁小萍(217)
“道德异乡人”与道德朋友·····	万慧进(224)
后 记·····	(230)

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论理想及理想主义的教育

万 斌 张应杭

【内容提要】 对理想追求的怀疑甚至冷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否认了人之为一个重要本质规定。然而理想之于人的生存而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也是幸福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高扬理想主义旗帜既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也是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 理想 信仰 幸福 理想主义教育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认知前提。但如果我们将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作一具体的分析便可以发现,这个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肯定其主流是积极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现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这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就是把理想一概视为“说教”。在这种观点看来,理想就是“有利就想”,前途就是“有钱就图”。面对着这类颇有信奉者的观点(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进行理论上的澄清,无疑是我们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一的理想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理论界关注较多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

性、类本质的思想^①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但还有一个结论似乎尚未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结论又恰恰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拥有理想并为实现理想而孜孜实践的存在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思想:最蹩脚的建筑师也要比蜜蜂高明,因为建筑师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未来的结果已存在于观念之中了。^③因此人要高于动物,因为对于动物来说,是这种动物之所是和做这种动物之所能是直接同一的。譬如对于一只蜜蜂来说,做一只蜜蜂就是做它本能所能做的事。而人则不同,人类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对自己活动对象的未来状态都在观念中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建构。这样一种对事物未来状态的自觉意识建构,我们可以统称为理想。从这点上讲,人类和动物界的分野与揖别,除了人类活动总有其自觉的理想建构之外,很难再有别的什么标志了。因而在马克思那里,理想同样构成了人的类本质规定之一。

因此,从最普遍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人类追求理想的可能性源于人类的意识具有建构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的能力,这也是人的自觉生活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而具有理想的一个内在标志。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指出过的那样:“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④这“预定的目的”也就是理想,它能被主体建构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

当然,应该明确的是,主体所建构的理想是由客观现实所产生,并以客观现实为前提的,因而决不能把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然而,由于理想总是以主观的愿望、希冀和向往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人们又往往很难直接看出理想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从而常常把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哲学史上,康德曾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倾向。康德的哲学是以“现象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割裂为特征的,这样一个特征也影响和规定了他对理想和现实这一矛盾关系的解决只能是彼此之间的割裂。他把社会划分为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在他看来,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各种必然性的制约和支配,是不自由的;只有到了理想世界中,人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他称这是一种最高的理性追求,是一种最合理的目的。但他同时又声称这种最高的理想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康德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2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57页

理想时这样批判过：“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惟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①在中国古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也表露了这种把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思想。作者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王国。但他也同样认为这样一个理想只存在于“迷离恍惚”之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复得路”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思想史上对理想问题的这些疑惑同样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在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现状进行省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的确有许多人正是从理想与现实的必然对立来否认理想的必要性，并由此而衍生了对共同理想追求的某种冷漠心境。

于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便是，在理想的追求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注定只能是非此即彼地对立吗？对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就必须考察理想的科学性问题。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康德、陶渊明所表述的并非科学的理想。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之中，它是从现实中汲取和提炼出来的。当然，人们在建构理想时必定要反映主体自身的要求和愿望，但这种要求和愿望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得以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无疑，人们所建构的理想也总是一种美好的想像。但这种美好的想像也不是悬浮于客观现实可能性之上的海市蜃楼。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理想的科学性是以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基础的，一个真正科学合理的理想必须把握着现实发展的未来趋势。因而在对现实可能性的把握和科学建构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便内在统一了。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把理想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可能性的一种超前反映。理想之所以是理想，理想追求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理想包含现实发展规律提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是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因而又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它以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却预示着现实发展前途的客观必然趋势。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曾这样深刻地分析过：“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性在它的展开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②

因而，理想作为主体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和超前反映，无疑是必须包含这种由客观必然性提供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其中之一。丧失了这种必然性的根据，理想就只能是一种空想。柏拉图曾是思想史上较早探讨了理想追求的古代哲学家。他在其著作《理想国》里曾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他对理想社会和理想追求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5页

② 黑格尔著：《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0页

诸种设想。但他的“理想国”却被历史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的“理想国”实质上是以一种旧氏族制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而这种氏族制的社会形态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的根据。显然,这样一个没能把握住社会发展必然性的理想,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马克思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①。连对柏拉图极为推崇的黑格尔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神话”^②。

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共同理想,恰恰是因为这个共同理想深刻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趋势。这个可能性趋势不仅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亚洲化时代到来所提供的,也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已成功地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所必然决定了的。我们对此应抱有坚定的信心。

当然,理想毕竟是指向未来的东西。因此,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探讨信仰问题。研究表明,许多人怀疑甚至否定理想追求的可能性,还源于这样一个认知上的理由: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科学性(或称可靠性)问题是无法确认的,因而理想追求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学者宾克莱在其著作《理想的冲突》中就曾这样断言:“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一种理想是对的,而其他各种都是错误的。确实,既然各种理想所谈的都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科学知识和逻辑二者还不能用来自行产生一个根本的价值委身。”^③所以,宾克莱的结论是,追求理想追求无所谓可能与否。后现代主义对理想问题的所谓“解构”,其根据之一也是认为,理想既然是指向未来的东西,自然永远是不确定的,它只有相对的意义。所以,他们反对马克思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④

其实,这种对理想追求可能性的怀疑和否认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的确,我们承认,对理想之科学性的检验问题有其逻辑上的难题。我们显然无法用实践过程中的主、客观相符作为评判的标准。因为一方面理想之所以称为理想就在于它是一种对现实的超前反映。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未来状态的设想和构造,理想在当前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的从而也被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05~406 页

②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 卷,第 185 页

③ 宾克莱著:《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17 页

④ 参见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Vol. XI, No. 1, Autumn 1979

明了的理想就已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对理想的检验问题倘若以实践标准来看,的确有其逻辑上的困难。正是为了摆脱这个困难,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信仰问题。

其实,理想作为一种蓝图尚未被付诸实践以前,在主体中必然涉及一个信仰问题。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人们尚未能在最终意义上解决理想的科学性问题以前,却能自觉自愿地为一种理想而努力地工作、学习和生活,这背后显然是信仰的坚定性在起作用。信仰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超越给定范围承认并相信一种实际上尚未出现的东西的主体精神活动。因而信仰经常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信仰诚然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我们却完全可以对它进行理性的分析。当然,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宗教信仰是一种盲目的、非科学的信仰。正如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的一位宗教神学家所说的那样:“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种信仰当然是和科学、理性相对立的,但科学的信仰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信念。这个信仰不仅不和科学理性相矛盾,而且是以它为根据的。对理想的信仰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是对由必然性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确信不疑的基础上确立和产生的。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仰本身就是作为理想追求的一个要素而贯穿于理想向现实运动过程之始终的。理想本身就必须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任何一个理想如果不转化为坚定的信仰,那这个理想就永远无法得到实现。著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曾以苏联宇航员完成宇宙探险飞行为例阐述过这个问题。^①的确,探索宇宙,使人类跨进宇宙的深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憧憬的一种理想追求。而且这个理想由于宇宙航行技术的发展而开始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但要使这个理想变为现实,宇航员显然还必须对这个理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抱有坚定的信仰。他必须让自己确信这一理想的真理性及其实验装置的可靠性。显然,这样一个科学的理想决不是那种宗教狂热分子进天堂的幻想。自然科学中的信仰是这样,社会科学方面的信仰也同样如此。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有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而表现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勇气概。对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又有谁会说这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呢!

也正是鉴于这样的缘由,我们在这里又非常强调信仰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把对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必须让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自己的人生观

① 《苏联当代哲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中形成对这一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并使这一信仰成为他们人生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一个基本结论:理想追求的可能性源于人的类本性,这种本性使人类必然要建构指向未来的理想以实现自己的类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理想的科学性的确信无疑便形成了科学信仰。这种科学的信仰又必定形成人的意志、决心等坚定性的情感品质,从而在主体那里生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物质手段相结合,才使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得以顺利地进行。而理想追求的可能性也由此变成了一种现实性。因此,那种认为“理想就是说教”的观点从本质上讲,恰恰是对人之为人一个重要本质规定的否定,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二、理想追求之于幸福生活的充分必要性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作为类的一种本质规定,人的理想追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理想追求的这一必要性源于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追求幸福是人类每一个个体生活的原动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人生真理。显然,人生如果不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而且不可想像。但究竟什么是幸福却是一个歧义纷生的问题。关于幸福对人生的意义,费尔巴哈曾这样说过:“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①但对于何为幸福他却没有给予明确的界说。其实,古往今来,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方式在谋求幸福。而且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也始终同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个体相联系。但我们认为,幸福还是可以被定义为人在追求及实现理想的过程中而体验的自我愉悦和欣慰的感受,而不幸则是这种追求遭到了否定或阻碍而产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一个人根本没能有效地确立一种生活理想,那无疑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我们景仰和称羨马克思的一生,这是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人生的幸福理解为一个追求崇高理想的斗争过程。他中学毕业时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曾这样深情而豪迈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

^① 《费尔巴哈选集》(上),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536 页

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无疑,马克思的一生是艰辛的,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窘迫使得他终生颠沛流离,直到逝世时他还是个无国籍者。但也正是在这种“为大家而献身”的理想追求中,马克思体验和领略到了人生最深沉而伟大的幸福和快乐。

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在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实现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愉悦感受,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要认为“斗争就是幸福”。因为理想的实现从来需要以对现实的抗争和奋斗作为手段。理想之为理想,本身就表明它与现实是不等同的,现实存在着的诸种“惰性”力量必然要阻挠理想的实现。这样,无论是社会理想、政治理想,还是人生理想,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无疑都需要斗争,甚至是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一斗争有着崇高的善的目的和价值时,他甚至可以在牺牲自己生命的同时,也依然体验到人生真正的幸福。因此,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能高吟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毅然地走向生命的自我牺牲。所以,李大钊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丽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音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丽的牺牲中。”^②显然,在这种壮丽的牺牲中,我们体验到的是最崇高最有价值的幸福。

特别有意义的还在于,一旦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对理想的一种追求,我们也就可以廓清现时代的人们在幸福问题上的一些认知迷障。这些认知迷障的存在对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论是必须克服的。

一些人把幸福理解为物质生活的充分享受。其实,由于幸福是对理想追求过程中的体验,所以决不能把幸福和充分的物质生活等同起来。因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并不总是带给我们物质享受的,更多的情形下这是人生旅途中一场艰苦而曲折的、需要极大意志力和忍耐力作为保障的人生长途跋涉。但只要我们心中拥有一个确定的理想,并因此有着一个坚定的信仰,那么,人生中再艰难困难的跋涉也会是一种幸福。所以,当人生理想实现时我们固然可以体验到幸福,但更多的时候是,对人生理想执著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因此,幸福如果如世俗的眼光那样只被理解成肉体感官上的享受与快乐,那么这就正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讽刺的那样:“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③也因此,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做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版,第7页

②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③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理想。”

还有一些人把幸福理解成利益的多多占有。其实这也是现代人对幸福的一种误解。我们承认,在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获得足够的利益,否则难以生活,但生活并不是为了占有利益。与此相反,占有利益是为了生活,否则利益的意义无法理解。利益的典型表现形式是金钱和权力,这些东西只有在生活中被用来追求某种理想时才生效,这意味着利益永远是手段,永远是一种中转方式。而幸福却是生活的目的,一切都为了幸福。所以,我们不能想像幸福还为了什么。因此,利益只是实现理想追求目的的一个条件,而幸福则是理想追求的目的得到实现的结果。正因为存在着这一区别,所以充足的利益也不能必然地保证幸福,或者说,并不蕴涵着幸福的必然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一些人还会这样追问:为什么对理想追求的追求必定产生幸福感,从而拥有人生的幸福?这一点,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因为这是人在完成自己类本质或者说在印证自己类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体验到的。既然拥有真、善、美的理想追求是人的类本质与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个本质规定,那么,以人的方式完成和印证自己,这自然会产生一种成为真正的人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决不是肉体感官上的快感,因为这种类似的快感其他动物也有。这种感觉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世界里属于神的东西,它是切实存在于现实人生中的。在我们拥有理想追求的目标并为这种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所开拓的生活是超越限度的,因此它必然是崭新的、有活力的、激动人心的。而这就是人生幸福的所有奥蕴。只要我们拥有理想并为这个理想而不懈地追求,那么,我们就会拥有幸福的真实体验。

由此可见,理想追求对于我们是充分必要的,否则我们就无从体验幸福。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理想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追求理想的人们,首先需要有一个能够激励理想追求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比一个不公正或者贫穷的社会更为可怕。在改革开放的现时代,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共同理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只有自觉地置身于这一理想的追求中才能真正拥有幸福的人生。而我们正是从这一点上特别强调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理想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三、理想主义教育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旨归之一

既然理想追求的追求是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是幸福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作为对人类生存境遇进行理性思考和智慧探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理想问题

的关注就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作一点思想史的巡视和回顾便可以看到,历史上思想家们对理想问题的探求可谓是源远流长,其著作更是卷帙浩繁。西方思想史上,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想天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性王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太阳城》、《乌托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为人类社会勾勒过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对人生“至道”的追求更是构成了历代思想家们为之上下求索的永恒主题:无论是孔孟讲的“仁爱”,墨子讲的“兼爱”,还是庄子讲的“无为”以及荀子讲的“制天命”,都对人类理想的生活境界作了详尽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渊阔的思想资料。

综观中外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事说,那就是凡在历史上发生了持久而深远影响的学说,它们几乎都关注、讨论和研究理想,都要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理想社会和塑造理想人格起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例,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在自己的学说中勾画了自己的理想学说。其中尤以儒家和道家对后世的影响为大。这个影响除了社会历史的根源外,也可以从他们的思想内部找到深刻的根源。这就是他们都十分注重探讨理想追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甚至他们的学说本身就是和道德理想、艺术理想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孟子提出了王道、仁政的理想社会,也提出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①的理想人格。庄子也有“至德之世”的理想境界,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理想人格。很显然,我们不难从文天祥、岳飞、史可法、朱自清等人那里看到孟子理想人格思想的影响;也可以从阮籍、陶渊明、李白,甚至柳亚子等人身上找到庄子《逍遥游》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哲学对理想的关注已成为必然。我们知道,哲学、科学、艺术、道德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归根结底都是探讨人的问题的,都是为了使人能在自己创造的理想社会里培养和造就完美的理想人格。这其中哲学作为人安身立命之本,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理想追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

因此,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说,它固然要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最一般的知识,但世界观决不应该是单纯知识的逻辑体系,它同时也应该是对客观世界的信念、价值和理想的理论体系。哲学在这里要通过对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确立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在把握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的活动提供自觉的理性指导。显然,这样一个指导是以理想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亦即是说,人们总在理想范畴中凝聚和积淀着认识世界的知识结晶和改造世界

① 《孟子·滕文公下》

的价值指向。所以,我们的哲学不仅要揭示自然发展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在这个基础上为人类自身提供科学的理想。只有这样的哲学,也才能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又是人们生活实践的安身立命之本,从而真正体现“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应该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视为关于世界观最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视为人类全部生活实践的理性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的理性智慧的深刻总结,而且也将是人类精神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面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想追求的关注就是这样一个证诸过去、来源于现实,而又着眼于未来的体现着主体性价值的规范和蓝图的创造过程。

因而,无论是哲学史的考察,还是逻辑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哲学要真正体现其世界观的职能,它不仅要以自己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规律来说明世界“是怎样”的实然状态,而且还应该在此基础上为主体描绘“应怎样”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对理想追求的关注和指引应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功能。

事实也的确如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学说的时候就赋予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以理想主义的情怀。这种理想主义的品性集中体现在他博士论文扉页上的一句名言上:“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所以,这个哲学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了精确的透视和分析把握,另一方面又从类哲学的高度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正因为这样,这个学说自诞生以来,才一直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中的这一理想主义职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还为当代中国人在现时代克服物欲的逼仄,实现自我解放提供最重要的理论启迪。

（我们知道,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正激发着当代中国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确立,又使这种追求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又表明了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物质与商品及其一般等价物——金钱对当代中国人的统治正在不断蔓延,对物质的占有和满足似乎正代替着我们生命的所有需要。于是,许多人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商品压抑着灵性、激情、意志、情感、理想等属于人的品性。而搏击商海成为社会的时尚,又加剧了商品对人统治的实现程度。可以认为,当代中国人正处于物化世界的挤压与逼仄之中。庄子“沉于物,溺于德”的见解似乎得到了某种绝妙的印证。所谓的“理想就是有利就想,前途就是有钱就图”的说法正是这一现实在思想观念中的折射。）